

黄谦,熊优,崔书琴,等. 社会支持、退役准备与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3): 19-29.

社会支持、退役准备与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

黄谦¹, 熊优², 崔书琴², 郑倩³, 岳文飞²

(1. 西安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8;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体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3. 西安体育学院 研究生部, 陕西 西安 710068)

【摘要】: 研究以社会支持理论和退役过程理论为基础, 从社会支持的3个维度分析其对我国专业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 并从不同等级运动员群体的异质性和退役准备的调节作用两个角度深入探讨社会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家庭支持、同伴支持与运动队支持是社会支持的3个主要支持维度, 共同促进运动员退役后的应对积极性; 在不同运动等级运动员中, 运动队支持及家庭和同伴支持对其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是不同的; 退役准备在家庭支持与同伴支持影响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实证结果支持以下结论: 家庭支持、同伴支持以及运动队支持是运动员退役过程中增强运动员职业转换的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增强对运动员能力的培养、加强运动队对中等水平运动员的关注与心理情感建立, 是提升运动员的劳动力价值的必要措施; 退役准备在退役期间作用明显, 其积极主动地迎合职业发展需求的退役意识显著增强了运动员与社会的链接, 可实现运动员退役期的平稳过渡。

【关键词】: 社会支持; 退役准备; 退役应对积极性; 专业运动员; 职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G812.3; F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1)03-0019-11

DOI: 10.15877/j.cnki.nsic.20210525.001

近年来,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体育强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竞技体育在体育事业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专业运动员(以下简称“运动员”)作为构成竞技体育的主体,能否合理安排选拔、训练、转业这3个关键节点,成为关乎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与关键^[1]。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以解决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各级教育、人事、劳动保障和体育部门也为拓宽退役运动员就业渠道积极创造条件,引导运动员适应社会需要。由此可见,构建并完善运动员职业转型支持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强国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2]。

在运动员职业转换中,社会支持体系的必要性体现为运动员个体发展的实际需要,包括心理适应需要、社会生存需要和个体职业发展需要^[3]。运动

员是否成功退役取决于能否很好地利用社会支持,其中,心理层面的社会支持会增加运动员的自我评价,提升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可能性,从而获得更多的再就业机会^[4]。目前,学界对于退役运动员社会支持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退役运动员职业转型的定性研究,对于退役过程中运动员心理层面的复杂应对机制和影响因素涉及较少。因此,为探究运动员群体在应对退役转型时自身态度所受到的影响,本研究从运动员的微观心理机制出发,以社会支持理论和退役过程理论为理论基础,从家庭支持、同伴支持、运动队支持等3个维度分析社会支持对我国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并进一步从不同等级

收稿日期: 2021-05-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61040029)。

作者简介: 黄谦(1971—),男,江苏江阴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体育人文社会学。

运动员群体的异质性和退役准备的调节作用两方面深入讨论社会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作用机制。

1 基本概念结构

1.1 社会支持

20世纪70年代初,精神病学文献引入社会支持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对社会支持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从社会互动关系来定义。Sarason提出:“社会支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客观存在或个体能感知到的互动关系”^[5]。第二,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来定义,认为社会支持是“一种资源交换形式,它源于由社会关系产生的帮助,或是人们的联系方式,或是支持网络中成员”^[6]。第三,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定义,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或群体对他人社会需要做出的反应,既指人与人的扶持、帮助行为,也指这种相互扶持、帮助行为的发生过程”^[7]。本研究更加关注运动员退役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不同类型的资源互动与交换对运动员是否产生差异或影响。因此,本文采用Gottlieb关于社会支持的观点,即社会支持是一种资源交换的形式,是在支持网络中运动员在人与人互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

我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多以自我为中心,根据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疏远程度逐渐向外扩展,因此本研究根据“序差格局”对运动员群体所受到的社会支持进行划分。在序差格局中,社会关系从个体内部推广扩展至群体外部,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和组织层面等3个层面。对运动员群体而言,基于运动员群体社会关系的疏远程度,运动员社会支持主要从以下3个维度进行划分:个人层面对应同伴支持,家庭层面对应家庭支持,组织层面对应运动队支持。其中,同伴支持主要来自朝夕相处的队友和有长期信任关系的朋友,家庭支持主要来自父母,运动队支持主要来自运动员培养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8]。

1.2 退役应对积极性

“积极性”最初源于心理学研究领域,是个体面对具体问题主动采取某些行为的驱动力。运动员作为一个特殊人群,当运动成绩在某一阶段达到顶峰时,其运动技能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伤病的增加逐渐下降,随之而来的是运动员退役转型问题。运

动员在退役转型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态度与行为将影响他们的应对策略。一般理论认为,退役运动员的应对策略有积极应对和回避应对两种方式。处于退役状态的运动员在退役过程中有些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有些则采用回避的应对方式^[9]。

运动员退役积极应对策略是运动员在面对退役问题时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与决策,其产生决策前对于退役转型在心理态度上会产生是否愿意积极主动面对的问题。因此,为了研究和分析运动员退役时的这种心理建设过程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心理学中对于积极心理品质的探讨及相关学者对运动员在退役过程中所采取的应对策略,把退役应对积极性定义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其主要体现在运动员在退役过程中会积极寻找工作机会、主动适应新的社会角色、自愿转型发展等。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社会支持与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在关于社会支持对退役运动员的作用机理研究中,较少关注退役运动员自身心理状态变化、积极心理品质、自我效能感知等内部因素对其择业选择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在运动员退役之后,家庭支持不仅给予了情感陪伴,以确保运动员能够进行有效的情感沟通与信息交流,同时还有助于他们积极主动地去建立新的生活方式^[10]。Cox等认为,经常与父母、教练、同龄人交流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可以增强运动员处理与职业发展相关问题的信心,这不仅使运动员能够正确接受新的生存环境,还可以帮助他们在步入新的岗位时将与之相关的运动员品质进行迁移^[11]。在运动员关系网络的范围内,运动员们所接触的来自不同人群的支持与帮助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刘羽等人认为运动员多维社会支持中可划分为信息性支持、陪伴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等4种,其中来自队友和家人的陪伴支持与情感支持,极大地增强了运动员退役之后的积极应对心理^[12]。因此,关注运动员的社会支持,对于运动员退役后所采取的积极应对策略也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 社会支持对运动员的退役应对积极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社会支持的概念可知,运动员群体社会支持的来源可以具体划分为家庭支持、同伴支持与运动队支持,因此,本研究假设可以进一步细分为:

H1a: 家庭支持对于运动员的退役应对积极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 同伴支持对于运动员的退役应对积极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c: 运动队支持对于运动员的退役应对积极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社会支持对不同等级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

社会支持作为外在因素影响退役运动员的顺利转型,但与此同时,运动员角色转换的心理过程也受运动员自身内在特质的影响^[13]。不同运动等级的退役运动员不论是职业关键能力、综合基础能力、沟通交往能力还是思想品德修养上,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14]。运动员群体的等级分层是指按照运动员的训练水平、技术水平和运动成绩进行的分层,是国家对运动员能力的一种认可与肯定的评定结果,其被相关研究学者视为一种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运动员专业人力资本水平,在退役运动员再就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调查表明,处于社会地位最高层的退役运动员大约有83.72%为世界级比赛的冠亚军;在社会地位次高层的退役运动员中,经理人员中有75%是奥运会冠军,私营企业主中有87.5%为国际比赛冠亚军^[15]。由此可见,运动员的运动成就在其退役再就业过程中是一块“敲门砖”。这意味着运动员在役期间的能力越高,退役后的社会资本越大,获取的心理资本即自信心也就越高,心理资本对运动员退役后的身份转化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不同等级运动员在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均表现出差异性,使得不同运动员群体的退役转型及社会化过程产生差异,也会使其社会支持影响下的退役应对态度产生差异化。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 社会支持对于不同等级运动员群体的退役应对积极性所产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2.3 社会支持、退役准备与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关系

社会支持通过帮助运动员建立职业选择、应对

新的生活方式等途径,对运动员的退役应对积极性产生显著影响^[16],这种影响主要是运动员以社会支持主体力量为主对自身退役后的状态产生正向的积极效益,而在退役过程中,部分运动员会在退役前主动为退役后的生活做出预先安排与计划,即退役准备,从社会支持的客体角度而言,运动员的主动性退役准备是关乎社会支持对运动员应对积极性影响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退役过程理论认为,退役是运动员运动生涯发展的自然过程,意味着运动员个体从一种社会文化进入另一种社会文化,其退役意识的形成也应是随之变化的自然过程。当其缺乏退役意识、无退役准备时,运动员的退役便会产生被动;反之,其自我意识得到不断强化,认知能力得以优化,对自身定位有较准确地评估,并且积极了解就业现状,主动构建职业愿景,在给予运动员社会支持同时,退役准备使得社会支持产生的机遇可以最大化的得以利用。此外,研究显示,在退役前主动建立退役意识,对退役后期生活有所规划的运动员,社会转换、身份转换更为成功,对退役后的新生活会表现出更积极的动机与情绪,生活满意度也更高。

从运动员职业发展的角度而言,社会支持是对运动员个体精神和物质上的慰藉、关怀、尊重和帮助,帮助运动员从心理上缓解运动员因退役引起的“社会焦虑综合症”^[17],为运动员提供积极的退役环境,从而提高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质量。在培养运动员个体其他方面的技能时,如参加教育培训等社会化职业训练,建立科学的职业发展规划等,运动员自身的适应社会变迁能力可以进一步提高,运动员在社会支持的积极环境中会更具竞争优势。社会支持可以缓解紧张的情绪和状态,是增进运动员身心健康及幸福感的重要保证,是外置“缓冲器”,但运动员退役前的自主性适应、核心能力素养的培养与发展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是运动员的内置“动力器”,可以帮助运动员在外置力量的支持下顺畅转型。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 退役准备在社会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同时,本假设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

H3a: 退役准备在家庭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

积极性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3b: 退役准备在同伴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3c: 退役准备在运动队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综合上述研究假设,本研究构建如下理论模型框架(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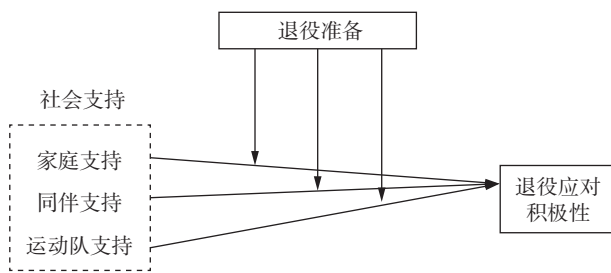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框架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从陕西、山西、天津、福建等4个城市的运动员训练管理中心选取以往参加过国家级及以上大型运动赛事的退役和即将退役的运动员作为调查对象,通过现场问卷发放和网络问卷发放相结合的方式,就社会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影响的相关研究数据进行收集。研究共发放与回收调查问卷均为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58份,问卷有效率86%。

3.2 变量设计与测量办法

本研究主要涉及的核心变量包括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退役准备、家庭支持、同伴支持与运动队支持等共计5个变量。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专业运动员在面对退役转型时的应对积极性;核心解释变量为反映社会支持3个维度的家庭支持、同伴支持和运动队支持;调节变量为运动员在临近退役时心理或行为上的退役准备。除上述核心变量外,本文还选取了能反映运动员个人特征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运动训练年限等4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在对核心变量进行测量时,本研究通过李克特5级量表来对调研对象的相关信息收集。各变量题项依次为“完全不同意=1”“基本不同意=2”“不确定=3”“基本同意=4”“完全同意=5”,根据各量表计算得分后通过均值化处理来构造样

本的衡量指标。其中,社会支持采用杜文姬等^[18]编制并修订后的SSQA量表进行测量,分为家庭支持、同伴支持、运动队支持等3个维度;应对积极性采用闫昱新^[16]编制的《中国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评价量表》经修订后进行测量;退役准备参考Thomas等^[19]编制的职业发展与职业态度量表进行测量。

社会支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客观存在或个体能感知到的互动关系,分为家庭支持、同伴支持和运动队支持等3个维度。

家庭支持主要来自运动员的父母和其具有亲密关系的家人,通过“未来发展中我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家人能给我可参考的意见或帮我找到解决方案”“我可以从家人那里获知工作机会或就业信息”“当我职业发展中遇到一些问题而使我情绪低落时,家人能给我安慰和鼓励”“由于职业发展而需要自费或部分自费的培训等学习机会,家人鼓励我参加,并给我经济上的支持”等4个题项进行测量。

同伴支持主要来自朝夕相处的队友和有长期信任关系的朋友,通过“同伴关心我的发展状态,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并且为我的职业发展问题提供可行的建议”“同伴鼓励我坚持自己喜欢的职业,相信我能在未来的工作中表现出色,增强了我的信心”“同伴面对我对职业发展中的抱怨、牢骚能完整听完,并给我安慰、鼓励、建议等”“与同伴间的交流缓解了后期发展带来的压力”“当我遇到经济困难,同伴会积极帮助我”等5个题项进行测量。

运动队支持主要来自运动员培养单位的相关人员,通过“对于我退役后工作中合理的要求等,运动队领导支持并提供给我”“运动队领导关心我退役后的工资待遇、福利等问题”“当我职业发展需要特殊帮助时运动队领导很乐于提供”“运动队会提供给我退役后的职业学习、培训的机会”等4个题项进行测量。

退役应对积极性是指运动员从心理状态到个人行为对退役转型表现出的积极主动的适应态度,通过“退役后我不再以运动员的身份自居”“我非常乐意从事退役后的其他工作”“我将退役后的工作看成自己的事情,并愿意全身心投入到新工作努力达成工作目标”等3个题项进行测量。

退役准备是指运动员选择退役前主动为退役后生活做出的预先安排与准备,通过“临近退役努力

调整好自己,准备迎接新生活”“退役前参加了职业规划的有关培训,为后期发展做准备”“我为退役后的生活积累了一些资金”“训练闲暇时间我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学习了一技之长”等4个题项进行测量。

3.3 数据分析方法

为检验社会支持、退役准备对于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机理,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主要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运用内部一致性方法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以检验样本数据的质量;第二阶段,通过描述性统计对调研样本的基本信息和变量数据的整体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第三阶段,研究将构建社会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先对社会支持的3个维度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调研运动员的等级进行分组回归,探讨社会支持对于不同等级运动员群体的退役应对积极性所产生影响的异质性;第四阶段,引入退役准备变量构建交互项,通过分层回归模型对退役准备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进一步明确社会支持、退役准备和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之间的影响机理,以验证研究所提理论假设并最终得出研究结论。

3.4 信度与效度检验

问卷信度。通过内部一致性方法以Cronbach's α 系数对回收样本数据的信度进行检验后发现,本研究所涉及的家庭支持、同伴支持、运动队支持、退役准备、应对积极性等变量的 α 系数介于0.833与0.905之间,均大于0.7,具有较高的信度(表1)。这说明本研究所涉及的5个变量共计20个题项所测量的数据具有一致性,其所得结果可以被视为来自一致的测量方式并进行加总平均处理。

表1 信度分析结果

Tab.1 Results of reliability analysis

变量	问项数	Cronbach's α
家庭支持	4	0.879
同伴支持	5	0.877
运动队支持	4	0.905
退役准备	4	0.833
退役应对积极性	3	0.880

问卷效度。KMO和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显示,研究所涉及问项的KMO值为0.741>0.5, Bartlett球体检验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为0.000<0.1,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进一步进行因子分析。对5个变量共

计20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通过最大方差进行旋转后共提取的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5个,其中,因子3为家庭支持、因子1为同伴支持、因子2为运动队支持、因子4为退役准备、因子5为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表2)。分析结果显示,5个因子的问项因子负荷均大于0.5,且没有横跨因子现象,说明问卷的测量问项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符合研究要求。

表2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2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问项	因子				
	1	2	3	4	5
家庭支持1	0.117	0.240	0.875	0.136	-0.048
家庭支持2	0.035	0.167	0.887	0.191	-0.086
家庭支持3	0.185	0.223	0.844	0.079	-0.092
家庭支持4	0.220	-0.100	0.679	0.228	0.371
同伴支持1	0.733	-0.010	0.081	-0.038	0.078
同伴支持2	0.669	0.115	-0.004	0.454	0.056
同伴支持3	0.852	0.069	0.227	0.235	-0.021
同伴支持4	0.802	0.115	0.018	0.191	-0.032
同伴支持5	0.857	0.102	0.206	0.075	-0.158
运动队支持1	0.107	0.861	0.147	0.116	-0.241
运动队支持2	0.142	0.821	0.334	0.216	-0.042
运动队支持3	0.008	0.907	0.030	0.096	0.042
运动队支持4	0.081	0.808	0.124	0.115	0.106
退役准备1	0.237	0.023	0.127	0.779	0.074
退役准备2	0.329	0.338	0.036	0.649	-0.068
退役准备3	-0.030	0.122	0.240	0.798	0.150
退役准备4	0.155	0.169	0.171	0.810	0.058
退役应对积极性1	0.105	-0.138	0.028	-0.005	0.913
退役应对积极性2	-0.171	0.048	0.070	0.180	0.880
退役应对积极性3	-0.015	0.031	-0.135	0.037	0.888

4 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为本研究调研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首先,从控制变量所反映的样本基本信息来看,258个有效运动员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29.71 ± 3.52 岁,其中男性运动员135人(52.3%),女性运动员123人(47.7%);所有运动员群体中有232人(89.9%)训练年限超过9年,仅26人(10.1%)训练年限不足9年;本科学历212人(82.2%),硕士研究生学历46人(17.8%);健将138人(53.5%),国际健将48人(18.6%),一级运动员72人(27.9%)。可见,本研究运动员样本的年龄、训练时长等基本信息整体契合我国专业运动员的实际情况,运动级别较高,成绩突出,且基本处于即将退役或刚退役阶段,符合本研究需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通过将核心变量的问项打分进行加总平均,研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variables

变量	样本量	统计量 (X±S)	变量	样本量	统计量 /%	
因变量			性别	女	123	47.7
退役应对积极性	258	3.66 ± 1.00		男	135	52.3
自变量			受教育程度	本科生	212	82.2
家庭支持	258	3.43 ± 1.25		硕士研究生	46	17.8
同伴支持	258	3.47 ± 1.11	训练年限	9年以内	26	10.1
运动队支持	258	3.51 ± 1.17		9年及以上	232	89.9
调节变量			运动等级	国际健将	48	18.6
退役准备	258	4.08 ± 0.52		健将	138	53.5
控制变量				一级运动员	72	27.9
年龄	258	29.71 ± 3.52				

究得出了各个核心变量的衡量指标。就样本核心变量的整体分布情况而言,258个样本在面对退役转型时所得到的家庭、同伴与运动队支持,以及其自身在应对退役时的积极性平均得分均在3.5左右。对比5分满分的标准可以发现,研究收集的运动员样本在退役时获得的外界社会支持和其自身应对退役时的积极性整体较高。就退役准备的平均得分而言,样本运动员退役准备的平均得分为4.08,且分布较为集中,说明目前多数运动员在退役前都会提前建立退役意识,并通过技能培训或自主学习等方式做出退役规划。

4.2 社会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4.2.1 社会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

为了验证社会支持的3个维度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同时筛选剔除掉其他非核心变量的影响,本研究采取逐步回归法,分为两个模型对其进行验证。模型1中只加入了4个控制变量,分别为性别、年龄、训练年限及教育程度,其目的在于考察控制变量是否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产生影响。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反映社会支持3个维度的核心解释变量,以观察社会支持以及控制变量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是否发生变化。由于被解释变量退役应对积极性为连续取值,因此采用OLS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表4),模型1的拟合程度以及整体模型的显著性较差($R^2=0.002$, $F=1.121$, $P=0.347>0.1$),可见控制变量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可以判断性别、年龄、训练年限以及教育程度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不存在影响作用;模型2的拟合程度以及整体模型的显著性较高($R^2=0.791$, $F=139.865$, $P=0.000<0.01$),

表4 社会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效应分析结果

Tab.4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on athletes' retirement coping initiative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标准化系数	VIF	标准化系数	VIF
性别	-0.098	1.021	0.003	1.054
	(-1.554)		(0.093)	
年龄	0.024	1.044	0.003	1.053
	(0.377)		(0.105)	
训练年限	0.040	1.001	-0.014	1.015
	(0.649)		(-0.504)	
教育程度	-0.075	1.023	-0.034	1.029
	(-1.184)		(-1.163)	
家庭支持			0.360***	3.648
同伴支持			0.296***	4.129
运动队支持			0.298***	3.477
			(5.607)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01$ 。

且3个核心解释变量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P<0.01$)。

模型2的分析结果显示,加入3个核心解释变量后各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VIF均小于5,自变量间不存在高度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其中,家庭支持的系数最大,运动队支持和同伴支持的系数接近,说明家庭支持对于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最大,而运动队支持和同伴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差异不明显。综上所述,社会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家庭支持、同伴支持和运动队支持越高时,对运动员退役后的应对积极性产生的直接正向影响就越显著,由此,本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

目前,有研究证实运动员退役后面临转型决策时,父母、同伴、教练或领队的支持会对职业探索和选择产生积极的影响^[20]。本研究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同伴、运动队以及家庭对于运动员退役转型过程中微观心理上的积极正向影响同样不

可忽略。在退役期间,由于突然面临职业转型,运动员难免会产生心理上的焦虑感和紧张感,而同龄的伙伴、家长以及运动队教练或领队对于运动员的支持,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运动员的退役压力,给予他们心理上的信任及依赖,并为其退役转型发展提供实质性的物质帮助,从而使得他们得到更好的调节与适应。从运动员自身心理状态这一层面为出发点,个体的心理占有会促使个体对目标物产生责任感,从而产生积极的行为^[21]。经常与父母、教练、同龄伙伴交流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可以增强运动员处理与职业发展相关问题的信心,提高退役运动员寻求转型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为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积累经验、增加保障^[22]。

4.2.2 社会支持对不同等级运动员群体退役应对积极性影响的异质性

为了系统展现社会支持对不同等级运动员群体退役应对积极性影响的异质性,本研究将通过不同等级运动员的相关变量整体分布差异对比分析,和社会支持对不同等级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影响的分组回归分析两个阶段进行讨论。

第一,不同等级运动员群体的社会支持与退役应对积极性整体分布差异(表5)。图1~4分别展示的是不同等级的运动员在退役应对积极性、家庭支持、同伴支持和运动队支持这3个变量上的分布情况。

表5 不同等级运动员在各变量上的分布差异

Tab. 5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of various variables among athletes of different levels

变量	国际健将		健将		一级运动员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退役应对积极性	4.035	0.611	3.610	0.991	3.505	1.160
家庭支持	3.696	0.988	3.386	1.203	3.344	1.458
同伴支持	3.936	0.793	3.307	1.083	3.498	1.255
运动队支持	3.996	0.684	3.426	1.165	3.367	1.351
N	48		138		72	

在退役应对积极性方面。国际健将在退役应对积极性上的平均得分为4.035,普遍高于健将和一级运动员,但国际健将的标准差最小,分布比较集中(图2)。说明国际健将在面对退役时,所采取的态度和表现会更加积极乐观。在家庭支持方面。研究所设计的4个变量中,国际健将和一级运动员在家庭支持方面的平均得分最低,分别为3.696和3.344,同时,不同级别的运动员之间在标准差上的差异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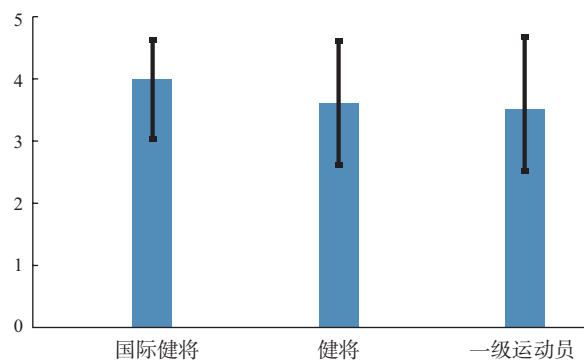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等级运动员在退役应对积极性上的分布差异

Fig. 2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of athletes of different levels in retirement coping initiat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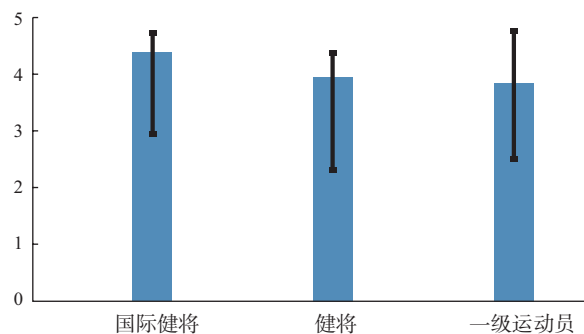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等级运动员在家庭支持上的分布差异

Fig. 3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family support among athletes of different levels

(图3)。说明国际健将和一级运动员在退役后从家庭方面所获得的支持较少。

在同伴支持方面。不同级别运动员在同伴支持上的标准差差异不大,分布都相对集中。不同级别运动员在退役后所获得的同伴支持普遍都较多,其中,一级运动员获得的同伴支持平均得分为3.498(图4)。说明一级运动员在退役时,更愿意寻求同龄人、朋友、队友等人的帮助。

在运动队支持方面。国际健将在运动队支持方面的均值最高,但标准差最小,分布比较集中,说明运动队对国际健将退役后的整体认同程度和支持程度都较高(图5)。同时,国际健将和健将运动员在运动队支持方面所获得的平均得分普遍高于其他两项社会支持,说明运动成绩越好的运动员,所获得运动队支持也越多。

从上述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分布对比情况可见,国际健将相比于健将和一级运动员,除了在各变量上的分布更加集中以外,在退役应对积极性以及各项社会支持变量的得分也相对较高,说明国际健将在退役过程中,会比其他等级的运动员有着更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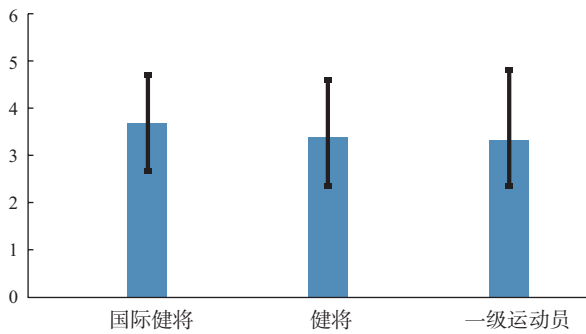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等级运动员在同伴支持上的分布差异

Fig.4 Differences in distribution of peer support among athletes of different leve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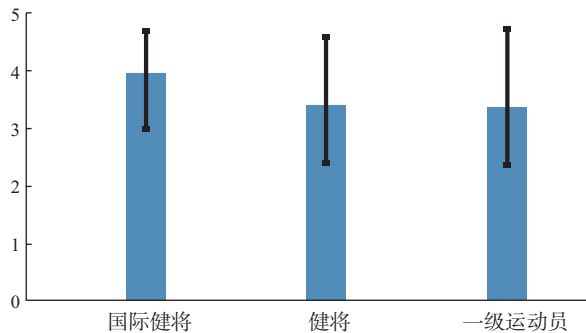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等级运动员在运动队支持上的分布差异

Fig.5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ports team support among athletes of different levels

接受程度与应对心理。同时,他们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也比其他等级的运动员更多。通过直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在运动队支持方面,国际健将的运动队支持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因为高水平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与教练、运动队领导等人的关系更为紧密,因此,他们从运动队所获得的关注和支持要多于其他运动员。相关研究显示,不同特质的运动员在退役过程中表现出的应对态度是具有差异性的,而运动等级相对较高的群体在心理资本的得分也呈现出较高的趋势^[23]。运动员当前所获得的运动等级,离不开平日的刻苦训练和在赛场上的优异表现,这些都体现出运动员自身所具有的品质和强大的心理素质,因此,运动等级越高的运动员,更能将与之有关的运动品质进行迁移,表现出更加积极的状态。

第二,社会支持对不同等级运动员群体退役应对积极性影响的分组回归结果(表6)。本研究根据运动员子样本群体的不同,通过模型3~5分别检验社会支持对其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被解释变量退役应对积极性为连续取值,因此,采用OLS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

表6 不同等级运动员群体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国际健将	健将	一级
性别	0.045 (0.598)	-0.00 (-0.162)	-0.023 (-0.452)
年龄	-0.067 (-0.816)	0.042 (0.948)	-0.040 (-0.843)
训练年限	-0.066 (-0.910)	0.031 (0.705)	-0.078* (-1.687)
教育程度	-0.026 (-0.341)	-0.05 (-1.320)	0.007 (0.137)
家庭支持	0.327*** (2.983)	0.364*** (4.480)	0.375*** (3.353)
同伴支持	0.291** (2.504)	0.286*** (3.380)	0.299** (2.390)
运动队支持	0.372*** (2.927)	0.274*** (3.670)	0.286** (2.670)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模型3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国际健将群体而言,家庭支持、同伴支持以及运动队支持对退役应对积极性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P_{[家庭]} = 0.005 < 0.01$, $P_{[同伴]} = 0.017 < 0.05$, $P_{[运动队]} = 0.006 < 0.01$)。结合描述性统计结果可见,当国际健将接收到来自家庭成员、同伴以及运动队三者的支持时,退役应对积极性都得到显著的提升。其中,家庭支持($\beta = 0.327$)与运动队支持($\beta = 0.372$)对国际健将群体有着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

模型4分析结果显示,对健将群体而言,家庭支持、同伴支持以及运动队支持对退役应对积极性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P_{[家庭]} = 0.000 < 0.01$, $P_{[同伴]} = 0.001 < 0.01$, $P_{[运动队]} = 0.000 < 0.01$)。说明当健将群体收到来自家庭成员、同伴以及运动队三者的支持时,其对退役应对积极性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家庭支持的得分每增加1%,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得分将增加0.364,而运动队支持和同伴支持对健将群体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效果不大,说明健将群体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越紧密,交流越频繁,从他们身上所获得的支持越多,越能提升他们退役应对积极性的水平。

模型5分析结果显示,一级运动员的家庭支持、同伴支持以及运动对支持对退役应对积极性有着显著正向影响($P_{[家庭]} = 0.001 < 0.01$, $P_{[同伴]} = 0.020 < 0.05$, $P_{[运动队]} = 0.010 < 0.05$)。其中,家庭支持($\beta = 0.375$)的影响更大,同伴支持($\beta = 0.299$)和运动对支持($\beta = 0.286$)的系数接近,在促进效果上相当,说明对于一级运动员而言,家庭支持对其退役应

对积极性产生的直接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综上所述,社会支持对不同等级运动员的退役应对积极性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验证了主效应“社会支持对退役应对积极性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的观点。但是对于不同的样本子群体而言,在其影响的具体大小上还存在一定差异。结合回归结果可见,社会支持对不同等级运动员群体退役应对积极性所造成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假设5成立。

分析发现,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在国际健将群体中,运动队支持对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其他两项社会支持维度,说明运动等级越高的运动员更容易得到教练和运动队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当运动员的运动等级越高时,其在运动时的成绩和表现也越好,因此也更容易受到中心领导以及其他人的支持与青睐。而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群体中,家庭支持对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其他两项社会支持维度,说明等级越低的运动员在面对退役的过程中,更容易获得来自家人的帮助和支持。此外,这也说明上文提到的“社会支持理论”中运动队支持适用于运动等级较高的群体,家庭支持适用于运动等级较低的群体。因为对高水平运动员而言,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训练环境中,不仅加强了同队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且更能感受到相互之间的扶持与帮助,因此高水平运动员在社会支持得分要显著高于其他运动员,处于中上等水平。同时,高水平运动员的积极应对得分要显著高于消极应对得分,这是由于高水平运动员本身所从事的体育运动本身性质决定的,在面对一些困境和挫折时,等级更高的运动员更愿意接受事实并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表现出积极应对方式为主的态度^[24]。

4.3 退役准备对社会支持与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挖掘社会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机理,研究在主效应和异质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退役准备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分别以应对积极性为因变量,以家庭支持、同伴支持以及运动队支持为自变量,以退役准备为调节变量构建以下分层回归模型:

$$\text{模型 6: } JJX = \alpha_0 + \alpha_1 \text{CONTROLS} + \alpha_2 \text{JT} + \alpha_3 \text{TB} + \alpha_4 \text{YDD} + \alpha_5 \text{TY} + \varepsilon$$

$$\text{模型 6' : } JJX = \alpha_0 + \alpha_1 \text{CONTROLS} + \alpha_2 \text{JT} + \alpha_3 \text{TB} + \alpha_4 \text{YDD} + \alpha_5 \text{TY} + \alpha_6 \text{JT} * \text{TY} + \varepsilon$$

$$\text{模型 7: } JJX = \alpha_0 + \alpha_1 \text{CONTROLS} + \alpha_2 \text{JT} + \alpha_3 \text{TB} + \alpha_4 \text{YDD} + \alpha_5 \text{TY} + \varepsilon$$

$$\text{模型 7' : } JJX = \alpha_0 + \alpha_1 \text{CONTROLS} + \alpha_2 \text{JT} + \alpha_3 \text{TB} + \alpha_4 \text{YDD} + \alpha_5 \text{TY} + \alpha_6 \text{TB} * \text{TY} + \varepsilon$$

$$\text{模型 8: } JJX = \alpha_0 + \alpha_1 \text{CONTROLS} + \alpha_2 \text{JT} + \alpha_3 \text{TB} + \alpha_4 \text{YDD} + \alpha_5 \text{TY} + \varepsilon$$

$$\text{模型 8' : } JJX = \alpha_0 + \alpha_1 \text{CONTROLS} + \alpha_2 \text{JT} + \alpha_3 \text{TB} + \alpha_4 \text{YDD} + \alpha_5 \text{TY} + \alpha_6 \text{YDD} * \text{TY} + \varepsilon$$

为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在原始数据加总均值化的基础上进行中心化处理得到变量JT、TB、YDD、TY。其中JT*TY、TB*TY、YDD*TY分别为家庭支持、同伴支持、运动队支持与退役准备的交互项,代表退役准备对3个维度与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关系的调节作用,当模型6'、7'、8'的系数 α_6 显著时,则说明退役准备具有调节作用,当系数为正时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反之则为负向调节作用。受篇幅限制研究在此仅展示模型6'、7'、8'的分析结果(表7)。

表7 退役准备对社会支持与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影响的调节效应

变量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性别	-0.010 (-0.353)	-0.016 (-0.536)	-0.004 (-0.131)
年龄	-0.006 (-0.219)	-0.008 (-0.290)	-0.002 (-0.076)
训练年限	-0.015 (-0.531)	-0.014 (-0.505)	-0.014 (-0.495)
教育程度	-0.036 (-1.261)	-0.030 (-1.043)	-0.036 (-1.263)
家庭支持(中心化)	0.363*** (6.768)	0.360*** (6.756)	0.361*** (6.683)
同伴支持(中心化)	0.309*** (5.366)	0.318*** (5.557)	0.305*** (5.231)
运动队支持(中心化)	0.299*** (5.708)	0.288*** (5.512)	0.306*** (5.790)
退役准备(中心化)	-0.047 (-1.538)	-0.036 (-1.156)	-0.054 (-1.723)
家庭支持*退役准备	0.073** (2.501)	--	--
同伴支持*退役准备	--	0.091*** (3.038)	--
运动队支持*退役准备	--	--	0.038 (1.291)

注:“***”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1$ 。

结果显示,3个模型的拟合效果均较好($R^2_{\text{模型6}} = 0.798$; $R^2_{\text{模型7}} = 0.800$; $R^2_{\text{模型8}} = 0.794$)。其中模

型6'的结果显示($F=113.704, P=0.000<0.01$),退役准备与家庭支持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073,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提前做好退役准备能够引导运动员更好地认识自我,提高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使得其在就业过程中具备选择的主动权,切实保障退役运动员职业发展的有效性。运动员退役后,面临的最直接的现实问题是转型求职较难,家庭作为运动员的港湾,为运动员提供着财、物、情感等各方面的支持,家庭资本的积累与帮助可以提升退役运动员的劳动力价值,提高其就业质量^[25]。运动员提前准确评估自身聪明才智,可更好地把握个人能力和特长,确定最佳职业发展方向,在家庭资本的积累中更容易选择到符合自身兴趣与特长的职业道路,进而增强运动员退役后对职业发展的积极性态度。因此,退役准备在家庭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此结论支持本研究假设3a。

模型7'的结果显示($F=115.356, P=0.000<0.01$),退役准备与同伴支持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091,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同伴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会受到退役准备的正向调节作用。在运动员进入专业训练后,绝大多数的时光是与队友朝夕相处,更多的精神支持便是来自同伴的交流,和谐融洽的关系带给运动员极大的心理慰藉,使运动员产生归属感,营造了舒适平稳的心理环境。对运动员而言,退役前后社会地位落差、比赛的小过失及年龄伤病等会影响其退役后的状态而产生“社会焦虑综合症”^[26],退役准备往往可以提升其自我控制感与心理素质,这无疑增强了运动员抵抗情绪壁垒的软实力,帮助运动员建设更健康的心理环境,使得运动员在职业与生活上获得更高的满意度,对职业转型的自信心增强,进一步缓解退役所产生的消极心理,从而扩大同伴支持对其退役应对积极性的正向影响。因此,本研究假设3b成立。

模型8'的结果显示($F=111.154, P=0.000<0.01$),退役准备与运动队支持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038,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运动队支持对运动员退役态度的影响不因运动员退役准备而产生差异,因此,本研究假设3c不成立。分析其原因,由于运动员职业的特殊性,在役期间必须全身心投入

训练与比赛,退役后会因职业转型而受到困扰。运动队是运动员专业能力培养与性格习惯形成的基本单位,对运动员提供几乎所有的生活需求,运动员缺乏相关的就业指导,就业意识淡薄,运动员与运动队更多的是建立情感性支持,远远大于职业发展支持。因此,运动队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不受退役准备的调节。

综上所述,退役准备的正向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家庭支持和同伴支持对运动员退役积极性的影响上,而运动队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不因运动员自身的退役准备有所区别。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于社会支持对于专业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机理,从运动员的微观心理机制出发,以社会支持理论和退役过程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社会支持对我国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加入退役准备的因素,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其与社会支持对运动员退役应对积极性影响间的关系。综合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3点结论。

第一,在退役期间,社会支持力量是运动员积极面对退役转型、就业难关的必要条件。在运动员退役期间,同龄的伙伴、家长以及运动队教练或领队对于运动员的支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运动员的退役负担,进而建立心理上的信任及依赖,通过为其退役转型发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从而使运动员更好地调节且适应社会。因而,当家庭、同伴以及运动队在运动员退役转型时给予的心理关怀、身体关怀和物质帮助越多时,运动员自身在面对退役时的积极性态度则可以显著提升。

第二,在退役期间,运动员获得的支持也取决于在役期间的运动成绩。运动等级越高的运动员意味着其在役时的运动成绩和表现更好,运动员自身价值的影响力更大,更容易得到教练和运动队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且受到中心领导以及其他人的关注与青睐。而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群体中,由于自身价值映射范围有所局限,运动员对家庭的依赖会进一步形成,因而退役支持的力量则更多来自家庭。运动等级是关乎运动员退役资本积累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运动队对中等水平运动员的关注有所欠缺,

运动员提升自身能力的同时,加强运动队对中等水平运动员的关注与心理情感建立,可以增强运动员的劳动力价值,帮助退役运动员就业。

第三,在退役期间,主动建立退役意识可进一步实现顺畅转型。退役过程中,能显著增强家庭支持与同伴支持对退役应对积极性影响效应的是退役准备。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运动员的应对积极性,退役准备还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退役准备的重要作用是提前剖析个人能力和特长,准确评估自我,这种自我评价可传递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得运动员对就业这类长期职业生涯规划进行准确地自我定位,在可控范围内进行抉择,确定最佳的职业发展方向并提升就业质量。当运动员在退役前主动为退役后的职业生涯做出充分准备时,家庭与同伴的支持可以在原有基础上更好地提升其退役应对积极性。

参考文献:

- [1] 朱楠,代瑞金.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和规律考察[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0(4):120-127.
- [2] 任保平,王薇.“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绩效及“十四五”新发展格局的构建[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1,36(1):22-31.
- [3] 刘玫.我国运动员职业转换社会支持体系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3.
- [4] 王进.我国运动员退役意识与心理状态的定量分析[J].心理学报,2008(4):496-506.
- [5] SARASON I G, SARASON B R. Life event, social support and illness[J]. Psychosommed, 1985, 47(2): 156-163.
- [6] GOTTLIEB B H. Assess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on mental health [J]. Social work, 1985, 30(4): 293-300.
- [7] RYFF C D, SINGER B. Interpersonal flourishing: A positive health agenda for the new millennium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4(1): 30-44
- [8] 杜文娅,仇军,张帆,等.运动员社会支持量表编制与检验[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11):94-100.
- [9] 王进.从过程理论观点探索我国运动员的退役(1)——退役意识、心理状态与应对策略的调查[J].体育科学,2006(7):47-54.
- [10] 常娟.我国退役运动员角色转换的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7):49-55.
- [11] COX R H, SADBERRY S, MCGUIRE R T, et al. Predicting student athlete career situation awareness from college experiences [J]. Journal of Clinical Sport Psychology, 2009, 3(2): 156-181.
- [12] 刘羽,张力为,张连成.运动员多维社会支持量表的研制[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13,32(12):1095-1102.
- [13] 杨文礼,翟丰,高艳敏.心理韧性与基本心理需求:影响运动员情感表达与运动表现的因素及中介效应检验[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0,37(4):488-496.
- [14] 常娟.我国退役运动员角色转换的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7):49-55.
- [15] 张晓丽,阎晋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中国退役运动员收入影响比较[J].上海体育学院报,2020,44(4):31-40.
- [16] 闫昱新,胡咏梅.《中国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评价量表》的建立及测评[J/OL].中国体育科技.[2021-04-07].https://doi.org/10.16470/j.csst.2019152.
- [17] 邹月辉,孝飞燕.不同权变因素下运动员薪酬满意度评价的差异性分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0,37(6):712-720.
- [18] 徐伟康.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中“同意”原则适用的检视[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12):40-45.
- [19] THOMAS L K M, RUSSELL W F. Applications of Rasch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 [M].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10.
- [20] MARY E. ROGERS, PETER A. CREED A. IAN GLENDON.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adolescent career planning and exploration: 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8, 73(1): 132-142.
- [21] 程国萍,陈蓉,王莉.虚拟社区社会资本对顾客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心理所有权视角的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0,35(11):121-128.
- [22] 陈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建构的理性向度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1):154-160.
- [23] 刘为坤.资本视域下上海市退役运动员社会分层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9.
- [24] 谢永稳.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 [25] 师博.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20,33(2):10-14.
- [26] 庞兵武.近年来我国运动员退役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J].武术研究,2021,6(2):142-146.

(下转第39页)